

见建庙。从总体上看，清代以来，对于妈祖这个保佑海上平安的超自然力量的膜拜，已经从沿海扩展到闽东内地县份的许多信众。

闽东内地相当一部分亲水文化资源与沿海有很强的联通性。发达的河流是一个例证。闽东山区溪流众多，河网密集，在水库、水电站不曾过度开发的岁月里（其实距今也不过几十年的时光），蕉城霍童溪的船运可以从八都出海口一直通达今日洪口乡（莒溪），屏南寿山乡的木材可以沿溪直接“放排”到蕉城霍童。福安、寿宁间的交溪船运可以从下白石出海口经赛岐镇换船直达斜滩镇山岭之间。适应山溪穿行需要的小舢，俗称“溪利”，载货一吨左右，船速快慢随水量丰枯和风向顺逆而变，上行往往需要纤夫牵引。清末民初，寿宁的斜滩槽常年维持在一百只上下，运送各样商品，不避人货混载，构建了巨大的物流网络和快捷的信息通道。

闽东山区的跨水建筑，有品类丰富的桥梁。从营造技艺看，以木拱的科技含量最高（2009年10月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闽东木拱桥存量约为全国的一半左右，其中山区五县占了7/8以上，沿海四县不及1/8。从人文禀赋看，则以桥屋风采最值得留意。闽东很少见到没有亭屋的老桥，不仅木桥，便是石桥也大多覆盖了亭廊。这里气候多变，桥屋可以遮阳、挡风、避雨，过往行人多在两侧条凳、条椅上歇息、乘凉、聊家常、做生意。逢年过节，还在规模较大的桥屋里铺台搬演戏文杂耍。在当年公共设施寡陋的山村，桥屋成为质朴乡民岁时聚会的好场所。由此，又派生出另一项重要的文化功能，即在桥中、桥头，借廊屋设龛祭祀，明中叶以后，逐渐成为风行远近的民俗景观。此外，

桥碑、桥联、梁上墨书等也大多承载了丰富厚重的历史意味。<sup>①</sup>

闽东文化资源的亲水性向，在族群分布格局上还有一个特异的表現。畬族本是生活在山地的族群，借助明中叶以来“倭寇”在沿海侵袭劫掠和清初禁海迁界、开界之反复，旧徙、新徙闽东的畬族人口得以入居沿海 30 里内外的乡村之中。又由于上文所述这里山区“格子状水系”的细碎分割，畬汉族群不易发生摩擦和冲突，畬民可以更快适应环境，定居下来。这就使得闽东这个全国最大的畬族聚居区，畬族居住格局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现在宁德市畬族人口的将近 60%，畬族建置村的 90% 以上，畬族自治乡的 100%，分布在沿海 4 个县份。这是与畬族也较多分布的粤、浙、赣三省很不一样的。畬族在新的地理环境和族群生态中，有选择地吸取汉族文化，有限度地利用滨海文化，逐渐形成自己的文化基质，笔者称为“滨海畬族”。<sup>②</sup>

归结以上所述，笔者认为，宁德设区市的代表性统一文化虽然迄今尚未形成，但它所辖各地的地表形态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各地在文化资源的层面具有一些基本的共性，新的文化中心也正在成形之中，从而为进一步的文化整合提供了初步基础。

（原载《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0 年第 10 期，刊出时略有删节，这是原稿。）

---

① 详见林校生主编：《闽东虹桥实录》第 2 章，宁德市政协文史资料第 2 辑，2003 年。

② 参见林校生：《滨海畬族：我国东南族群结构的一大变动》，《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 年第 5 期。



## 滨海畬族的文化新质

2010年，我写成《“滨海畬族”：中国东南族群分布格局的一大变动》（《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这篇文章的问题意识是，畬民本是山地族群，长期过着迁徙游耕的生活，何以如今却主要定居在滨海的省份、县份和乡镇，尤其是现在的闽东北沿海地区成为畬族最大的集聚之处，这片新区对他们有什么重要的影响，他们对当地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现在根据这篇文章，集中谈谈明清之交畬族规模化迁入闽东北以及伴随而来的其文化上的相关变化。打算分三个大点来谈。

### 一、“滨海畬族”的出现

滨海畬族是我提出的概念，用以指称明清以来，畬族分布格局的一个显著变化，即闽东北逐渐成为这个族群的最集中的棲息地。这里的闽东北，指明代以福宁府（州）为中心、历史上有过共同辖属关系的8个县，即今霞浦、福安、宁德、福鼎、寿宁、周宁、柘荣、连江、罗源、政和以及现在归属宁德市的古田、屏南等计12县地域。

闽东北共有11个畬族乡，从南至北分属连江、罗源、宁德（今蕉城区）、霞浦、福安、福鼎等6个沿海县份。现在的宁德市9个县（市、区），其中4个在沿海。宁德市有9个畬族乡，全部分布在这4个沿海县份。蕉城（原为宁德县）的金

涵，福鼎的硿门和佳阳，霞浦的盐田和水门，直接就在海边。福安的坂中、康厝和穆云，离海边有点距离，但也在长溪中游的主支流（穆阳溪）上，与长溪在福安入海处的几个港口大镇水路相通。只有崇儒畬族乡距海稍远，但它所在霞浦县正是全国海岸线最长的县份。

宁德市现在有 230 个畬族村委会，其中沿海四个县份共有 210 多个，占总数的 90% 以上；扣除沿海县份中离海稍远的畬族建制村，包括蕉城赤溪镇的两个村，福安潭头、上白石和社口三镇的 12 村，霞浦崇儒、柏洋二乡的 10 村，福鼎管阳、蟠溪二镇的 5 个村，仍有 186 个建制村，也占总数的 80% 以上。<sup>①</sup>

从人口自然分布角度看，宁德师院赖艳华写过《闽东畬族居住格局初探》一文，把闽东畬族人口分布划分为三大聚居区：福安交溪（应称作长溪）流域，福鼎、霞浦、蕉城（原宁德县）沿海一带，古田溪水库周边及水口水库上游；指出鼎、霞、蕉三县沿海一带畬族人口为 7 万多人（已扣除崇儒），占闽东畬族人口的 44.48%。<sup>②</sup> 但如果只就“滨海畬族”一点来考察，应当将赖文中长溪下半段赛岐、溪柄、甘棠、下白石和湾坞 5 个乡镇的畬族人口划入统计范围，则将近 9 万人，所占百分比将近 60%。而且，按笔者的视角，长溪中游的坂中、

① 本文对畬族村委会的数量统计，依据缪品枚、雷丹丹编撰的《闽东畬族全书·乡村卷》所搜集罗列的材料，该书系民族出版社 2009 年版。但畬村总数根据宁德市民宗局的最新材料作了相应的修正。

② 赖艳华：《闽东畬族居住格局初探》，载《宁德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4 期，收入《宁德师专学报畬族研究文选》，2009 年 10 月。



韩阳、城阳三地和其主要支流穆阳溪中段的穆云、康厝、溪潭三个乡镇都距海口不远，旧时通航条件很好，海船的客、货换乘溪船，可以顺利运抵长溪中游两岸<sup>①</sup>，情况有些类似于福州疍民之沿闽江而一路迁徙到上游的南平、建瓯、邵武和将乐（参见“维基百科”网的“福州疍民分布图”），只是他们离海比闽北疍民近得多。如果把这里将近3万人也作为“准滨海人”来理解，所占比例就更高了。

现在大家常说全国畬族一半以上在福建，福建畬族一半以上在宁德地区。笔者提出“滨海畬族”这一概念，意在凸显这个散居民族的最大聚居区的地理特征，如上文所述，从人口自然分布到畬村聚落分布再到畬族乡行政性分布，统计单位的层级越高，畬族滨海意味越强（60%→80%—90%→100%）。

相对弱势、落后的畬族人口竟然在相对强势、先进的汉族地区，在汉族本身人地关系已显紧张的福建沿海地区大规模集结，这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这个特殊历史条件，笔者以为主要是从明嘉靖“倭患”到清初迁界复界造成的人地关系大变动。这里的基本思路，是把晚明“倭寇”侵掠与清初迁界复界联系起来考虑。

新近读到陈春声数年前发表的《从“倭乱”到“迁海”：明末清初潮州地方动乱与乡村社会变迁》<sup>②</sup>，这篇长文认为，

<sup>①</sup> 南宋梁克家《三山志》卷六《地理志》载：“官井洋港……白沙溪船至斜滩（在长溪上游，属寿宁县境），廉首船至缪洋（即穆阳，当时的穆阳包括今穆云、康厝）。”

<sup>②</sup> 该文刊载在朱诚如主编《明清论丛》第二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

从明代天顺年间至清代康熙中期长达二百余年，潮州地方社会的动乱与“转型”应有理由视为一个连续的过程；其中“从明嘉靖至清康熙的一百多年间，是潮州乡村社会逐渐被乡绅阶层控制的重要转折时期”。虽然陈文的地理坐标在潮州，话题焦点是民间社会秩序的建立，基本不涉及畬族，但视野开阔，仍给笔者思考畬民大量入迁闽东北滨海地区的历史背景带来不少新的启发。

## 二、闽东滨海畬村群的形成

闽东北历来山海环抱，远离喧嚣，百姓生活“不贾而足，虽荒岁不饥”<sup>①</sup>，很少受到兵革动乱的冲击。从明代中叶到清初的百余年间，却接连遭受“倭寇”之洗劫、南明清军之激战、“迁海开界”之反复，沿海遂常有荒残之地，畬人得以离开深山临时搭盖的草寮而人居，渐由游耕转为定耕，建房兴村。这些畬村，多数海拔不高。现有的 230 个畬族建制村，笔者查得 212 村海拔情况，兹将闽东沿海县份和山区县份各海拔高程（单位：米）的村数（单位：个）列示如下：

海拔 村数	100 以下	100—200	200—300	300—400	400—500	500—700	700—900
沿海县	65	35	33	27	25	11	0
山区县	0	1	0	0	2	9	4

说明：（1）材料主要采自前揭《闽东畬族文化全书·乡村卷》（189 村），其余采自蓝运全、缪品枚主编《闽东畬族志》（民族出版社，2000

<sup>①</sup> 明·何乔远：《闽书》卷三八《风俗志》，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4 年校点本，第 947 页。



年)、俞郁田编《霞浦畬族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蓝存干主编《宁德市(今蕉城区)畬族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1年)。

(2) 海拔高程数据,“100 以下”含 100,“100—200”指  $100 < a \leq 200$ ,余同此例。

以畬族建制村作为统计标准,有它的局限性,不能全面反映包括自然村在内的海拔情况,而且村落规模存在古今差异,当年的“主村”未必都会成为今日的建制村,反之亦然。但就总体而言,上表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闽东北畬族聚居村的海拔分布格局:海拔较高的畬村,集中在山区县,但总数无多;沿海地区畬村多,且海拔不比同区的汉族山村高,也不比它们偏僻,典型者,如福安溪潭镇,共有 11 个畬族建制村,仅瓜溪海拔 230 米,张家山海拔 160 米,其余都在 70 米以下,其中 6 村在 10—30 米之间。它们只有一村为纯畬族村,而十个畬汉杂居村,一半畬族人口多于汉族,一半汉族人口多于畬族。

这是以建制村为单位而作的描述,深入到它们所辖的众多自然村,情况会更加复杂些。日本学者富田芳郎(1895—1973)曾经提出集居、集村与散居、散村的概念,“所谓村落,就住宅的配置上说来,可以大别为集村〔集居型〕与散村〔散居型〕两类。前者是数十数百所密集在一起,后者则是每一处耕地中分布着一所或者数所。”(详见其《台湾乡镇之研究》,《台湾银行季刊》1955 年第 3 期)畬民村落,不仅可以是“集村”,也可以是“散村”,后者是明清畬人很常见的居住形态,所谓“在丛菁邃谷,或三四里或七八里始见一舍”<sup>①</sup>,便是其写照。

<sup>①</sup> 见清道光本《建阳县志》卷二《輿地志·附畬民风俗》。

据《霞浦县畬族志》引述 1989 年的调查材料，全县畬族聚居的自然村有 501 个，其中 186 村畬族人口占 90% 以上，381 村畬族人口占 60% 以上。<sup>①</sup> 那么，畬族人口比例在 60% 以下甚至不如汉族人口多的自然村，尚有 120 个。郭志超指出，与其他地方不同，“闽东畬汉杂居的情形多一些”。<sup>②</sup> 笔者认为，畬汉同村杂居，与这些村庄上述位置特点，是有一定联系的。

闽东畬村群的形成，必须以畬族人口较大数量的繁衍为基础，而相对贫困的畬族人口的繁衍，又必须以获得基本口粮为保障，这就牵涉到明代中晚期以来福建粮食作物结构的一个重大变革。何炳棣早在 1956—1957 年就为文著书具体论证美洲粮食作物玉米、番薯、花生和马铃薯在中国的传播对于人口增长的巨大作用。<sup>③</sup> 这些农作物后来在畬村也都颇为流行。当然，影响人口数量变化的因素十分复杂，何炳棣便谈到其他经济、行政因素和天灾（旱、涝）、兵灾的影响，周翔鹤、米红还补充论证了明清气候变冷的影响<sup>④</sup>。仅就闽东北畬村的大片成长而言，那些从美洲传入的不仅平原、而且可以种在丘陵的旱地、瘠土的高产作物，特别是度荒所赖的番薯，使无数贫苦畬民免于死亡，确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件。我们的这个看

---

① 俞郁田编纂：《霞浦畬族志》第 2 编第 1 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98 页。

② 郭志超：《畬族文化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第 168 页。

③ 参见何炳棣著，葛剑雄译：《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三联书店，2000 年，第 215—228 页。

④ 见周翔鹤、米红：《明清时期中国的气候和粮食生产》，《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 年第 4 期。



法，可以在明代何乔远的《闽书》，清代的《福宁府志》、《宁德县志》、《福安县志》等方志的记载中得到部分印证。

畬民开始大量集结闽东北的时候，机缘巧合，也正是番薯逐渐在这里推广开的时候。当地畬谣：“番薯米，吃到老。”这大大降低了畬民的死亡率。我们不能想象，没有番薯的传入和传播，畬村会像大把明珠般洒落在闽东北大地。

### 三、滨海畬族文化之新质

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的改变，畬汉相邻乃至相杂而居村落格局的出现，促使畬族社会生活逐渐有所变化，产生了一些文化新质。

其一，生产生活方式中的海元素的渗入。闽东北有些畬村，直接就在海边，如福安下白石镇的长坑、坑门、樟澳诸村，湾坞乡的半屿村；霞浦牙城镇的凤江村，溪南镇的后慕、小马、炉坑诸村，盐田乡的南塘、姚澳诸村，北壁乡的盘前村，松港街道的大沙村；福鼎佳阳乡的象阳、罗唇诸村；蕉城漳湾镇的雷东、又加塘诸村，八都镇的金垂村，等等。半屿所辖的鹤屿和小马所辖的竹江两个畬族自然村，还是海中的小岛屿。这些村子往往都有大片的滩涂，可以于农业之外兼营小海渔业，现在还发展了多种海产品养殖业。<sup>①</sup> 不过，海边畬村数量不多，而且闽东北的汉民的海洋利用方式，传统的也是以海为田，作为农业的一种空间延伸，畬民更是如此。它对族群文

---

<sup>①</sup> 关于畬族渔业的情况，很少得到反映。目前介绍最多的，是蓝炯熹总纂的《福安畬族志》（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见该书第11章。

化品性的影响，不宜估计过高。

其二，原有信仰与本地神明间的互动。畬族多元崇拜，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接受当地民族村民所信奉的“神明”。闽东富有特色的民间信仰，以陈靖姑和林公大王最为通行。据传，林公大王实有其人，名祖亘（也单称亘），善于搏虎，祖殿在今周宁玛坑乡杉洋村，建于明中叶（成化年间），后遍及闽东北。畬民主要供作猎神和村庄保护神。陈靖姑信仰与畬民巫术文化则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契合，二者同属“闾山教”谱系，在畬族巫师科仪唱本中，恭请陈靖姑行罡作法都是一项核心内容。有畬族学者认为，陈靖姑等三奶夫人实际上“已经具备了作为畬族内部神灵的资质”，在明清陈靖姑信仰的造神运动中，“大量迁入闽东方言区的畬族也参与其事，其中畬族巫师扮演了重要而特殊的角色。”<sup>①</sup>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可以看作是汉、畬两种文化在交流碰撞中产生文化新质的一个例子。

其三，儒家思想的浸润与牵引。畬族文化以蛮、越为底色，与儒家观念位差过大，二者原本难以相合。但到了他们迁徙至汀、漳一带的时候，畬、客往往同在一山，这两大边缘族群接触较密切，文化上发生初步交流，彼此都受有对方的影响。<sup>②</sup>而闽东北为丘陵沿海地带，海岸线绵长却富含内陆品

<sup>①</sup> 蓝焰：《畬族巫术文化中的陈靖姑信仰——以福州、宁德畬族乡村为例》，《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4期。

<sup>②</sup> 畬族文化对客家的影响，可参见吴永章、谢开容《客家文化与畬族文化关系研究》，收入罗勇主编《“赣州与客家世界”国际学术研究会论文集》，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年；客家文化对畬族的影响，可参见谢重光《明清以来畬族汉化的两种典型》，载《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1期。



性，且区位僻远，与浙江当时比较落后的温、处地区紧紧相连，这里的汉族，社会发展水平不很高，但朱熹理学在民间有一定的传播。畬族入迁时，二者的文化位差已有所缩小，加上这里人口密度比闽西高，村间及至村内畬汉杂居势不可免，文化采借逐渐从器物、技术层面上升到价值取向。霞浦白露坑半月里是著名的畬族文化名村，但房屋、坟墓形制与当地汉族无异，门匾、墓碑都标榜先祖出自中原世家。村陈列室收藏了一双“三寸金莲”绣花鞋。<sup>①</sup>一座清代秀才大厝在大门内侧还专设女眷过道，不与大厅相通。这其中，有客家文化的印记，也有闽东北汉族文化的影响。闽东北畬族谱牒的谱序、谱论、谱式、谱例，都贯穿着儒家伦理准则。族谱大多是请汉族文士修撰，他们在尊重东家文化基质的同时，也必然带进自己的儒学认知（由畬族读书人自己修谱，情况并无二致）。请人修谱的过程以及自身参加祭谱、阅谱的过程，成为学习儒家学理知识的过程。清光绪年间，由江西萍乡人钟大琨主持，历时7年修成157乡（包括城区居民点和祠堂3处）钟姓连环谱，其中137乡属闽东北沿海三县，加上罗源县6乡，合占总数的95.3%，可见本文指称的“滨海畬族”对谱事的热情和重视，也多少可以反映出儒学家族伦理对他们的影响。在新环境中畬民原来的“善嘯聚”“喜仇杀”的风习也渐渐有所变化。

其四，尝试运营“民族一家族”企业的新经验。到了清代，闽东北成为福建的重要茶区，茶市兴盛。1874年（同治

---

<sup>①</sup> 有村民说鞋是嫁过来的汉族女性所穿，不知是否确实。但纵使如此，这鞋和鞋主人作为异文化符号在该家庭中的深度嵌入，也会产生一系列晕染效应。

十三年)，宁德县八都猴盾村畬民顺应华茶对外贸易形势，开始创办茶庄，收购周边二县数十个畬村的茶叶，形成畬族茶叶专业市场，年销干茶 4000 多担，并择地开铺，兼营煤油、布匹、海产、山货，雷氏商号闻名遐迩，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繁荣。其主要经验，是农商并举，依靠“畬家阵”之间的相互信任，民族意识与家族伦理融为一体，构建和维护“茶农——猴盾茶市——福州茶叶中心市场”的稳定经济网络<sup>①</sup>。畬民本不经商，以往他们迁徙所至，也都是偏僻山林之地，农耕气息浓厚。而闽东北在明代就有重商风气。<sup>②</sup> 八都是霍童溪的出海口，水、路交通条件不错。当咸丰、同治间太平军四次入闽，武夷山从陆道运往广州茶叶外贸受阻，福宁府从水道到福州的茶路便迅速代之而起，猴盾畬村遂有机会成为所在一带的茶叶集散地，这里的畬民遂有机会成长为优秀的茶叶商人。

其五，族群权益意识、维权实践的初步表现。不能说畬民在大量迁入闽东北滨海地区之前就没有权益意识和维权实践，<sup>③</sup> 但确实少有记载（这与他们尚处徙居游耕阶段有关），也缺少官府方面在法制框架内的互动。明中叶以来的情况，经

① 详见蓝炯熹：《近代闽东一个畬族村落的茶叶商帮》，《宁德师专学报》2008 年第 1 期，收入《宁德师专学报畬族研究文选》，2009 年 10 月。

② 张瀚《松窗梦语》卷四《商贾纪》载：“福州会城及建宁、福宁……民多仰机利而食，俗杂好事，多贾治生。”按，张为江南商业中心杭州人，官至吏部尚书，万历年间辞归故里，以平生见闻著为《松窗梦语》八卷。今有中华书局点校本。

③ 例如，明万历癸酉本《漳州府志》卷十二“獠人”条即载畬民“其与土人交，有所不合，胥毆讼理，一人讼，则众人同之；一山讼，则众山同之，土人莫敢与敌”。



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畬民入迁之初，渐渐从游耕过渡到定耕，各地乡保摊派差徭，有无、多少，缺乏统一则例，畬民乍受摊派，特别不服，向地方官府强烈要求“免差徭”。县堂大约考虑到他们偏远零散，人少村贫，尚未站稳脚跟，答应给予宽免，并立碑明示。碑已不存，但清光绪年间重修的福安甘棠田螺园《冯翊雷氏宗谱》和福鼎华洋（双华）《汝南蓝氏宗谱》中各保存2篇这种文告<sup>①</sup>，时间跨度为康熙三十七年至嘉庆七年。

闽东北畬村编图隶籍以后，征赋摊差相对规范化，畬民维权重点逐渐转向社会治安问题，尤以恶丐强乞与盗贼抢偷最为突出。于是，吁请县衙“出示严禁”，经过批准，畬村在路边勒石立碑，有的还成立巡逻自卫队<sup>②</sup>。这些碑刻或碑文，现尚存十余通，时间集中在光绪年间。常见的评论，把丐盗骚扰及前述的“免差徭”都归属为“阶级剥削”“民族压迫”，这当然有相当的理据。但总的说来，清代官府对闽东北畬族的政策还是相对比较宽和的。故笔者以为，冲突的发生和展开，与人口压力增大后的资源竞夺、不同族群的文化传统隔阂以及晚清畬民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意识的觉醒，也有一定关系。

如果说差徭负担、丐盗骚扰主要涉及畬民基本生存权的层面，那么，争取平等参加科考，则已上升至发展权、政治权的层面。1802年（嘉庆七年）福鼎童生钟良弼赴福宁府试，书

<sup>①</sup> 这4篇“免差徭”文告，新出缪品枚编《畬族文化全书·谱牒祠堂卷》已收录，见第229—231页，民族出版社，2009年。

<sup>②</sup> 蓝炯熹：《晚清闽东畬族乡村的乞丐问题——以九通“禁丐碑”碑文为中心》，《民族研究》2007年第5期。

生王万年串通生监诬蔑畬族五姓为“犬生”，将钟赶出考场。钟在乡亲捐助下，变卖家产，层层上告至省衙，经巡抚李殿图批复，才获得圆满解决。此事一方面被官府编入志书（道光本《福建通志》），一方面被畬民编成“长连”（小说歌），在闽浙畬区广为传播，影响极大。新近在紧邻福鼎的浙江苍南县（1981年从平阳县析出）发现道光年间畬民雷云“反阻考”诉状手稿，他在省、府二级官衙“缠讼三载”，写过23次诉状，1847年温州知府终于颁布了《禁阻考告示》<sup>①</sup>。钟良弼和雷云的事迹，从他们自身方面看，表明晚清“滨海畬族”（苍南一带地块实与闽东北连为一体）在经济有了一定发展，与汉族有了较多交往之后，重视教育，捍卫科考权利，培塑本土精英的迫切诉求。

以上所述诸例，都属单向目标维权。1899年在霞浦创办的福宁山民会馆（后改称三民会馆、三明会馆），则可以看作是一个综合型维权的公益组织。在该会馆活动鼎盛期的30余年中，它以提供膳宿服务，促进畬族各姓的联谊；以搜集、整理畬歌，传播畬族文化；以举办祭祖大典，增加畬族的联宗凝聚，等等，大大扩张和突破了畬民原有组织的最高级形式——联姓宗祠的功能。因此，有的学者强调它是“畬族主要聚居区畬族民众联合组建的国内唯一跨省、跨地区的畬族社会团体”<sup>②</sup>；有的学者指出“山民会馆的创建标志着畬族人民民族意

① 见邱新福：《“反阻考”诉状重现清代科举制度歧视少数民族》，苍南新闻网，2008-09-03。

② 郁田：《畬族历史文化的一大地标亮点——中华畬族福宁山民会馆》，《福建民族》2010年第2期。



识的兴起”<sup>①</sup>，这都是很到位、很深刻的表述。笔者还特别关注它对内化解本族纠纷，对外则为畬民做主，代写诉状，代理官司，保护畬民合法权益，解决了多起畬民入学、畬汉山林、海埕纠纷。山民会馆表明进入民国时期，畬族的维权意识、维权实践达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

第五点所述各例，在畬族学界，已有过很好的关注和研究，我只是专从维权意识成长的角度作简要的梳理，或许有助于揭示晚明到民初闽东北滨海畬民文化新质的一个面相。

（据 2011 年 11 月 26 日上午在东南周末讲坛的讲座稿改成，原题“滨海畬族漫谈”。）

---

<sup>①</sup> 郭志超：《畬族文化述论》第 6 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

# 闽东历史文化资源保护问题 的初步考察意见

## 一、引言

今宁德设区市俗称闽东<sup>①</sup>。这里的历史文化资源非常丰富，且在相当长时期里保存完好。“文化大革命”后尤其是近些年来经济的低水平过度开发，以及人们的浮躁心理和观念偏差，本地文化资源的生态环境迅速全面恶化，闽东北历史文化资源保护问题日益严峻地凸显出来，亟待引起各方面的重视，下大力气去解决。

闽东的考古文化，从蕉城霍童的芦坪岗遗址和瓦窑岗遗址、霞浦沙江的黄瓜山遗址、福鼎店下的马栏山遗址、古田吉巷的浮档山遗址、福安湾坞的大头岗遗址和赛岐的金龙岗遗址等大量出土文物，可以追溯到三四千年前的商周时代，最晚这时就有相当数量的先民在闽东各地繁衍生息。若根据霍童溪两岸采集到的三件打制石器和十数件打制石片，我们甚至可以大胆推测在一、二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闽东就有人类活动的消息了，只是证物较为薄弱，尚待进一步研究。

闽东的行政建置，从《宋书·州郡志》的记载，可以追溯

---

<sup>①</sup> 从地理坐标看，今宁德设区市应称闽东北。实际上，陈襄《嘉靖福宁州志序》便已经说到“（福宁）州与福（州）、兴（化）、漳（州）、泉（州）、延（平）、建（州）、汀（州）、邵（武）釐为九路，直达于藩臬，盖巍然东北一巨镇也。”。